

波兰反思反犹太主义的进展与问题

杨友孙

(上海政法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 上海 201701)

[摘要] 冷战结束之后, 波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 开始对反犹太主义进行反思。虽然在冷战结束后第三个十年, 反思反犹太主义遭到一些挫折, 但反思反犹太主义已逐渐取代反犹太主义成为波兰新的“政治正确”, 反思反犹太主义也取得了众多具体成果: 波兰“犹太元素”明显增强, 反犹太主义根基削弱, 和以色列关系实现正常化, 积极参与和融入国际层面和欧洲层面的反思反犹太主义活动。由于波兰反犹太主义历史悠久, 反思反犹太主义还不够彻底, 以及右翼保守力量主宰政坛, 使波兰近年出现了反犹太主义回潮。不过, 反犹太主义回潮只是波兰历史上的反犹太主义的惯性和回声, 它虽然可能会断续出现, 但已进入下降通道, 其力道将逐渐减小。

[关键词] 反犹太主义; 大屠杀; 犹太人; 天主教会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1. 07. 018

冷战结束后, 中东欧国家出现了由官方主导的反思反犹太主义^[1]的思潮和运动, 一些历史敏感问题, 尤其是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遭遇得以重新认识, 犹太文化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一些人的犹太身份得以重新认同。波兰也较为积极地反思了其历史上存在的反犹太主义, 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 “百足之虫, 至死不僵, 扶之者众也”, 由于历史上波兰的反犹太主义影响深远, 短时期仍然难以断绝, 有时甚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恶化或逆转。对其成绩、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 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其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

一、波兰反犹太主义的历史长坡

虽然犹太人在波兰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

历史, 但反犹太主义的高峰在波兰却意外地持久。公元 933 年, 波兰尚未建国之时, 就出现了犹太人社团及犹太教堂。^[2] 波兰建国(966 年)后, 英国、法国、西班牙以及离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相继来到波兰。地广人稀的波兰以积极的态度接纳了大量犹太人。从 1025 年波兰王国建立, 到 1569 年波兰—立陶宛联邦建立, 波兰是欧洲最为宽容的国家,^[3] 甚至被称为“犹太人的天堂”。^[4]

从 9 世纪到 16 世纪, 波兰也存在着一一些反犹太思想和活动, 但规模性、高烈度出现的反犹太主义是从 1648 年开始的。这一年, 波兰的乌克兰地区发生了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冲突, 并导致严重骚乱, 直到 1658 年才平息, 波兰反犹太主义自此开始

迅猛发展,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走向高潮。

1939年,波兰被再次占领后,300万左右犹太人被杀,使波兰犹太人存活率远远低于世界任何国家。^[5]被占领期间,波兰的反犹主义并未消失,虽然不少波兰人援助过犹太人,但也有一些波兰人向纳粹揭发犹太人身份,^[6]成为“纳粹帮凶”。^[7]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反犹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犹太人再次成为波兰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羊,很多犹太人在“反修正主义”行动中失去了工作,至1961年,安全、警察部门和主要军事部门的犹太人被全部解雇了。1968年3月,因波兰政府禁止公演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引发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游行示威,波兰政府认为这是犹太人挑起的阴谋,要求犹太人对该事件负责,最终导致波兰再一次驱逐犹太人,约25000名犹太人移居国外。^[8]“三月事件”后,波兰大约只剩下5000~10000名犹太人。^[9]在波兰生活了千年的犹太人,已不再作为一个族群而存在,犹太传统和犹太生活方式进入了冬眠期。仅存的犹太人更加谨慎地隐藏着自己的犹太身份,不再参加犹太人宗教和组织活动。

二、波兰反思反犹主义的历史进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兰社会出现了自发的反思反犹主义现象,尽管是局部的、零星的,但为冷战结束之后的反思反犹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冷战结束之后,波兰政府开始主导了反思反犹主义活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在第三个十年里,反犹主义有所升级,反思反犹主义遭遇挫折。

(一)天主教会引领的局部反思反犹主义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1990年)

波兰社会反思反犹主义思潮主要是由天主教会启蒙的。1965年,罗马天主教会召开梵二公会,发表了《教会对非基督教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宣言》指出:基督徒与犹太人

既然共有如此伟大的精神遗产,本届神圣会议,极愿提倡并鼓励双方彼此认识与尊重,这特别可借助于研究圣经、神学及友谊的交谈而获致……此外,教会既反对迫害任何人,且纪念与犹太人共有的遗产,决非为政治因素,而实由福音仁爱的宗教理由所催迫,痛斥一切仇恨、迫害,以及在任何时代和由任何人所发动的反犹太人民的措施。^[10]

《宣言》发表之后,天主教会开始反思其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态度,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修复和犹太教的关系逐渐成为天主教的主流声音。80年代中期,天主教会主教委员会中设立了一个与犹太教对话的次级委员会,致力于反思反犹主义并修复波兰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1987年1月,天主教会文学评论家扬·布翁斯基(Jan Błoński)在《环球周报》上发表文章《贫穷的波兰人注视隔都》,承认波兰对犹太人有罪,“唯有来一次道德革命,才能逐渐清洗我们被褻渎的土地”。^[11]文章推动了波兰社会对反犹主义的反思。

在知识界和学术界,也出现了反思反犹主义的萌芽。1981年,扬·约瑟夫·里普斯基(Jan Józef Lipski)发表《两个祖国——两种爱国主义》一文,呼吁对波兰历史进行冷静及批判性反思。^[12]不久后,《团结工会周报》发表关于1946年凯尔采大屠杀^[13]的文章,^[14]促使人们关注和思考消逝在波兰书籍中的历史事件。雅罗斯瓦夫·马立克·芮姆德维茨(Jaroslav Marek Rymldewicz)的著作——《乌穆施拉格广场》(Umschlag Platz),以儿时经历为背景,回顾和反思了大屠杀期间的屠犹事件。^[15]1985—1986年期间,波兰巡回上演克罗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导演的电影《浩劫》(Shoah),引发了对波兰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此外,犹太文化和犹太记忆开始再次回到波兰社会的视野中,重建了一些犹太教堂和犹太公墓,在华沙和克拉科夫出现了一些犹太人研究中心,例如,1986年,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建

立了“犹太人历史文化跨系部研究中心”；一些犹太人社会、文化组织也开始出现，例如，1982年，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重新在波兰活动；“多样信仰宗教联盟”（the Religious Union of the Mosaic Faith）在80年代末出现了犹太拉比的身影。1988年春天，为了纪念大屠杀期间死去的人们，致敬以色列的独立日和大屠杀纪念日，开创了每年一度的“生者前行”（The March of the Living）活动，来自波兰、以色列、中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的几千名学生，被邀请到波兰参观大屠杀遗迹遗址、犹太纪念馆、犹太教堂，其中一个重要活动是从奥斯维辛默默集体步行到比尔克瑙（Birkenau）。^[16]

1990年，天主教会陆续出版了1965—1990年期间天主教皇——保罗二世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立场的教义，使其反思反犹太主义的主张逐渐为公众所知晓。^[17]1990年12月19日，波兰天主教主教团发布文件指出，反犹太主义违背了福音的宗旨，波兰天主教和犹太人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密切的历史联系，犹太人不需要为基督之死负责，“对在波兰土地上在任何时间，由任何人实施的所有反犹太主义的事件表示真诚的歉意”。^[18]这是波兰第一个对历史上的反犹太主义活动和事件进行道歉的文件，是波兰反思反犹太主义的一个重大突破。

（二）政府主导的全面反思反犹太主义阶段（1991—2010年）

冷战结束后，波兰政府松动了对宗教的管控，犹太人的宗教表达变得更加容易。1993年，波兰“犹太宗教群体联盟”（the Union of Jewish Religious Communities）成立，致力于推动波兰犹太宗教和文化活动的开展。1997年2月20日，议会通过“波兰共和国对犹太宗教团体的态度法案”，^[19]法案指出，犹太人社区及其组织不依赖于任何外国宗教或世俗力量而存在，给予犹太群体管理其内部组织、宗教和文化事务的权利，尊重犹太人的文化及习俗等。在波兰政府的支持下，犹太群体部分收回了一些教堂、犹太建筑和

其他遗物。例如奥斯维辛犹太教堂，就是在1997年“波兰共和国对犹太宗教团体的态度法案”指导下，波兰政府归还给犹太群体的财产之一。部分犹太人获得了德国政府对二战期间反犹屠犹而造成损失的赔偿，这被称为“正义归来”。^[20]

1998年，波兰议会发布文件，正式谴责了1968年3月事件中的反犹太主义。2000年，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在面对一群犹太学生时表示，自己作为波兰的总统和作为一个波兰人，对1968年的反犹太主义活动表示道歉。^[21]2001年7月10日，克瓦希涅夫斯基对波兰犹太人历史中的关键问题之一——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Jedwabne Massacre）^[22]进行了道歉。^[23]

官方反犹太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波兰教科书关于犹太人历史问题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波兰部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开始出现了关于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内容。冷战结束后，政府要求对涉及犹太人历史问题的教科书进行进一步改革。1993年，波兰的教科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大屠杀”（Całopalenie）一词。^[24]1994年，“波兰—以色列教科书委员会”签署了一个协议，规定“大屠杀教育”必须被普遍纳入波兰各层级的教科书之中。^[25]此后，波兰大屠杀教育开始逐渐普及。1996年，“大屠杀教育”被列入波兰高中阶段的核心必修课程。^[26]1999年，波兰改革了教育体制，将“大屠杀教育”扩展到初级中学和文法学校的课程之中。在初级中学的教育大纲中，与“大屠杀教育”相关的内容包括：发生在被占领土上的种族灭绝；集中营杀戮；苏联的强制劳动营；大屠杀。^[27]在文法学校的教育大纲中，相关内容则包括：进步 vs. 文明的危机；社会冲突；战争；种族灭绝；大屠杀。^[28]自此，大屠杀教育不再是波兰历史的插曲，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特事件。^[29]

（三）反思反犹太主义遭受挫折阶段（2011年之后）

尽管波兰对反犹太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反

犹主义并未完全销声匿迹。2011年之后,尤其是2015年具有较强民族主义倾向的右翼政党——法律与公正党(PiS)上台后,波兰的反犹主义有所升级,反思反犹主义遭遇挫折。

法律与公正党在2005—2007年首度执政期间,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政策”(historic policy),也称“遗产政策”(heritage policy)。“历史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打击各种形式的反波主义以及对波兰历史的伪造,尤其是涉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之时;始终提醒世界,波兰是德国和苏联侵略的受害者;到目前为止,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战争损失尚未得到赔偿;波兰对在这场战争中被杀害的人没有任何实质性责任;不论被杀害的是波兰公民,还是犹太人,这种罪行是德国人犯下的罪行,他们对种族灭绝政策的后果负责。^[30]

“历史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波兰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正面”书写波兰历史,本质是将历史问题政治化。对于否认纳粹侵略及“大屠杀”的观点方面,“历史政策”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但对于波兰是否应对犹太人在“大屠杀”中的悲惨遭遇负责,“历史政策”则极力淡化和回避,甚至担心过多描述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会损害波兰形象。

在“历史政策”的指导下,法律与公正党在2007年、2018年利用执政时机,对1998年通过的“关于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背叛波兰国家罪行检察委员会法案”进行了修改和强化。2007年的修改重点是针对波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态度,出台了“除垢法”(the Lustration Law),否定波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及成绩。2018年2月的修改是专门针对大屠杀历史问题的,出台了“大屠杀法”(the Holocaust Law)。该法规定,指责波兰民族或者波兰国家在纳粹的大屠杀中负有责任为违法行为,轻则处以罚款,重则判处3年监禁;如果使用“波兰死亡营”而非“纳粹死亡营”来形容二战期间的死亡集中营,也将被判以罚款或者监禁。^[31]由于遭到国内外犹太人及其

支持者的反对,以及美国、以色列等国的抗议,波兰议会才重新修改了该法案,删除了监禁的处罚,而只判处罚款,即该法属于民法的范围而非刑法的范围。^[32]

在社会上,近年来波兰的反犹暴力事件也有所增加。在很多抗议活动、游行示威、足球比赛中,甚至在国家节假日的庆祝活动中,都出现过不少反犹主义言论。例如,在2011年11月11日波兰独立日(复国节)庆祝活动中,一些新纳粹分子在游行中打出了种族主义和反犹排犹口号:“整个波兰都应该是白人”“犹太人侵蚀够了”。^[33]在2013年9月29日的一场波兹南对罗兹(这个城市曾以拥有大量犹太人而闻名)的足球比赛中,波兹南队的球迷对罗兹球迷喊出了一些具有反犹主义色彩的口号,例如“向前走,犹太人!你的家是奥斯维辛!”“进入烤炉”“到毒气室去”等。然而,在2014年1月的审判中,波兹南检察长认为波兹南球迷喊出的口号并不具有反犹主义色彩。^[34]2018年8月,克拉科夫、华沙等地的犹太公墓遭到破坏;2019年4月21日,波兰小镇普鲁赫尼克(Pruchnik)发生了丑化、殴打和烧毁犹太肖像事件;在2019年复国节中,弗罗兹瓦夫出现了极右翼的游行活动,他们喊出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口号,并最终导致冲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反犹主义虽然有所升级,但并非是过去反犹主义的重现,因为波兰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利用“反犹主义”作为争取民心和政治斗争的武器,反犹主义也不再可能作为波兰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替罪羊和解毒剂。相反,反思反犹主义已代替反犹主义成为新的“政治正确”。除了克瓦涅夫斯基总统针对波兰人在大屠杀中的责任进行过道歉之外,其他的一些领导人也都进行过道歉或反思。例如,2011年7月10日,在纪念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70周年大会上,时任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Bronisław Komorowski)代表波兰向犹太人进行了正式道歉,他说:“今天,波兰还能听到一个来自

波兰公民的从未消失的呼声(即承认波兰人参与了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我再次请求(犹太人)原谅。”^[35]此外,他还希望波兰人在认识到自己是纳粹的受害者的同时,也要接受自己也是罪人这个苦涩的事实。^[36]甚至法律与公正党也在公开场合强调反思和打击反犹太主义,为自己戴上道德与正义之帽。例如,曾任波兰总统的莱赫·卡钦斯基(Lech Kaczyński)就曾反复指出:“在波兰,反犹太主义无容身之地,而且,我们将竭尽所能,随时随地与之抗争。”^[37]即使在2018年3月8日的纪念1968年“三月事件”50周年大会上,在“大屠杀法”刚出台之际,波兰总统杜达(Andrzej Duda)仍然表示对1968年事件中被驱逐的犹太人进行道歉,同时代表波兰为当年的反犹行为道歉。^[38]

三、波兰反思反犹太主义的主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在天主教会、波兰政府和知识界的推动下,波兰反思反犹太主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反思反犹太主义”开始取代“反犹太主义”成为波兰的“政治正确”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反思反犹太主义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首先,波兰社会的“犹太元素”明显增强。

冷战结束后,随着波兰开始反思波兰历史中的反犹太主义,不少犹太人纪念馆所、犹太教堂、研究机构开始出现,认同犹太人的人数增加,众多历史纪念活动、文化艺术活动方兴未艾,绝大多数受到波兰政府或多或少的支持,波兰社会的“犹太元素”明显增强。

在纪念馆所和研究机构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反犹排犹浪潮之后,波兰的犹太纪念馆和研究机构基本消失,只有少数综合性博物馆或研究机构涉及到犹太人的历史,例如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博物馆(the Auschwitz - Birkenau memorial and museum)、华沙大学偏见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Prejudice)、波兰公共舆情研究中心(the Polish Centre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等。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波兰社会开始出现反思反犹太主义的声音,一些犹太研究中心、犹太教堂、犹太公墓等开始建立或恢复。自90年代初开始,一些大学陆续创立了犹太历史、语言、文化中心,例如,1993年,弗罗兹瓦夫大学创立了“犹太文化与语言中心”;2000年,卢布林的居里夫人大学创立了“犹太研究中心”;2005年,罗兹大学历史系创立了“犹太人研究中心”;2008年,雅盖隆大学创立了“大屠杀研究中心”;2002年建立了波兰犹太遗产维护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Jewish Heritage in Poland);2003年波兰科学院哲学与社会学研究所创立了“波兰大屠杀研究中心”(the Polish Center for Holocaust Research)。一度中断的“犹太人历史研究院”(the 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 ŻIH),也在波兰文化部的支持下,于新世纪前后进行了场所建筑和设施的翻新和装修;还有2007年开工、2014年10月28日最终落成的“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Polin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Polish Jews),以及目前正在建设,预计于2023年建成的“华沙隔都纪念馆”(Warsaw Ghetto Museum)等。此外,很多波兰地方犹太纪念馆、犹太人教堂也得以建立,例如,1983—1990年期间翻新后重新开放的兰卡特犹太教堂(Łańcut Synagogue);2004年建立于克拉科夫的“加利西亚犹太博物馆”(Galicia Jewish Museum),2007年,波兰历史最悠久的克拉科夫的犹太教堂——“犹太老教堂”(Old Synagogue)得以重新装修并开放;2007年重新开放的“卢布林犹太教堂”(Lublin Synagogue);2009年建成的“陶布犹太人生活与文化基金会”(the Taube Center for the Renewal of Jewish Life in Poland);经过10年翻新后于2010年重新开放的位于弗罗茨瓦夫的“白鹳犹太教堂”(White Stork Synagogue);2016年建成的位于马尔克瓦的“马尔克瓦博物馆”(Markowa Ulma - Family Museum of Poles Who Saved Jews in World War II)等。

在犹太历史、文化书籍与作品出版方面,反

映反思反犹主义题材的研究、文化、文学、艺术作品越来越多了。例如,1994年初米哈夫(Michal Cichy)的文章《波兰人与犹太人:起义期间的黑暗片段》讲述了1944年华沙起义期间波兰人杀害犹太人的历史事件。^[39]2001年,学术刊物《犹太历史季刊》(Kwartalnik historii Żydów)开始公开发行。影响最大的是2000年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波兰裔美国人扬·托马斯·格罗斯(Jan Tomasz Gross)在波兰出版的著名历史著作《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40]该书颠覆了正统观点——认为1941年7月10日的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事件是盖世太保和纳粹宪兵队干的,而非波兰人做的;作者还驳斥了关于“该小镇的犹太人与苏联侵略者有勾结”,“除部分社会渣滓外,普通波兰人未参与此次大屠杀”等观点。^[41]《邻人》恰似“原子弹”,引起了波兰政界、宗教界、记者、历史学家、知识分子和很多普通民众的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争议,被称为“国辩”。^[42]

此外,出现了多种多样的犹太文化活动。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2000年之后,各种犹太历史与文化大量增加,让已经消逝的犹太记忆开始复活,重新成为波兰国家特性的一部分。大多数活动是政府机构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的,其主题是唤起波兰社会对大屠杀历史的记忆,让人们去直面历史。例如,自1988年开始举办的克拉科夫“犹太文化节”活动;自2002年开始在罗兹举办的“四种文化对话节”活动;^[43]自2003年开始在赫梅尔尼克(Chmielnik)、平丘夫(Pińczów)、希德沃夫(Szydłów)等地举行的“遇见犹太文化”活动;自2004年在华沙举办的“犹太文化——歌唱家节”活动;自2007年开始在奥尔什丁举行的“犹太文化日”活动等。2009年6月17日,筹建中的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发起了“虚拟犹太小村庄”(The Virtual Shtetl)活动,在网络上通过波兰语和英语,以图片、数据、视频、文字等方式向外界介绍1900多个波兰的犹太村庄和小镇的真实生

活,2011年后,该活动从线上扩展到线上线下分别进行。^[44]2014年,“人性在行动”华沙工作组发起了“犹太人帖子”活动,主要是为了打击网络上的反犹主义的仇恨言论,通过各种方式来证明反犹主义的愚昧。

其次,波兰社会反犹主义根基明显削弱。

经过各种努力,波兰社会对犹太人历史,尤其是对大屠杀历史的了解明显加强了,这首先表现在“新犹太人”——1989年之后“发现”自己犹太身份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使90年代后半期波兰犹太人人口和犹太社会组织的成员数量都明显上升了。^[45]据估计,2005年,波兰的犹太人人口约有2万人,^[46]与之前几十年相比明显增加。而从波兰官方的人口统计结果来看,2011年,7353人确认自己为犹太人,而2002年时只有1055人确认自己为犹太人。^[47]

另外,很多调查表明,波兰人的反犹主义倾向明显下降了。例如一个调查显示,从1992年到2002年,波兰反对反犹主义的人口比例从8%上升到15.7%。^[48]另一个调查表明,1998年,31%的波兰人不会对反犹涂鸦感到不适或惭愧,而2008年,这个数据下降到24%;1998年,13%的波兰青年学生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其他一些集中营的大屠杀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而2008年,这个数据下降到5%。^[49]

此外,一个重要的研究发现,在波兰,从冷战结束到2012年,不论是传统反犹主义还是现代反犹主义^[50]都有所下降,而反思反犹主义的认知则明显上升。而且,波兰的传统反犹主义和现代反犹主义与民众的年龄、教育程度都有着紧密的相关性,即教育程度越高,反犹主义程度越低;年龄越小,反犹主义程度越低。^[51]对于在冷战之后出生的人来说,他们是在反思反犹主义的宏观背景下接受教育和成长的,他们持有的传统反犹主义和现代反犹主义倾向都明显低于上一代人。

再次,波兰和以色列关系实现良性发展。

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波兰给予了积极支持,双方关系一度非常不错。1951年,随着苏联

和以色列关系降温,波以关系也逐渐冷却。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波兰的反犹太主义开始与反以色列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反犹太主义注入了反以色列的新内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波兰出现改善波以关系的声音,双方社会开始互动。1986年,波兰政府主动与以色列接触,在对方首都相互设立了代表处,波兰成为首个与以色列建立官方代表处的东欧国家。^[52]1989年11月,波兰出生的以色列副总理西蒙·佩雷斯访问了波兰,与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和总理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进行了会谈,为双方外交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1990年2月27日,双方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此后,双方高层互访更加密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流日益增多,对于历史问题的共识也有所增加。

在经贸往来方面,1988年,双方共同成立了“以色列—波兰商会”(Israel-Poland Chamber of Commerce),双边商贸活动开始展开。1991年,双方签订“推动与相互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1997年,双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改善了双方经济交流的条件。^[53]

双方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强。2009年5月,波以签订“关于青年交流的协定”,使双边青年交流进一步加强,截止到2010年,双方共有15000名青年人通过政府支持的途径到对方国家进行了交流,使波兰在以色列青年对外交流中名列前茅。^[54]

在一些重要的大屠杀纪念活动中,波兰和以色列的领导人都会共同参加。例如,2000年9月,两国政要共同参加了奥斯维辛犹太教堂和奥斯维辛犹太中心的开放仪式;2011年2月,双方政府间年度咨询会在耶路撒冷首度展开;2018年6月27日,双方签署了一个联合宣言,同意支持和资助关于大屠杀的自由言论及研究,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太主义,促使波兰民族和犹太民族重新对话。^[55]2020年1月,在参加奥斯维辛集中营

解放75周年纪念活动之际,双方总统共同呼吁,在打击反犹太主义方面加强努力。波兰总统杜达指出,这表明双方都愿意积极反对一切形式的非人道对待及仇恨,特别是种族主义仇恨。^[56]

此外,两国共同合作,积极寻找二战期间冒险救助过犹太人的波兰“国际义人”(Polish 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截止到2019年1月1日,共搜寻到6992名波兰“国际义人”,居世界首位。^[57]

最后,积极参与、融入国际层面的反思反犹太主义活动。

波兰还较为积极地参与、配合国际层面和欧洲层面的一些反思、反对反犹太主义的一些活动。例如,在欧盟理事会倡导的“历史记忆教学——预防反人类罪教育”活动(Teaching Remembrance—Education to Prevent Crimes against Humanity),以及“大屠杀教育、记忆及研究合作国际特别小组”(the International Task Force for Cooperation on Holocaust Education)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影响下,2004年,波兰教育部决定,将每年的4月19日确定为“大屠杀记忆及预防反人类罪日”,这一天也正是1943年华沙隔都起义之日。2004年,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发布第607号决定,要求成员国加强反思反犹太主义教育,增加大屠杀纪念活动,波兰积极响应,并派专家参加欧安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的专家团队,与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The Holocaust Martyrs' and Heroes' Remembrance Authority)一道,就如何组织大屠杀纪念日提出了建议。^[58]2007年1月27日,联合国将奥斯维辛解放的日子定为“国际屠杀纪念日”(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为了推动“国际屠杀纪念日”深入人心,波兰的“大屠杀纪念日”活动和“大屠杀纪念周”活动在很多波兰学校开展起来,在纪念日和纪念周期间,学校常常发起大屠杀展览、为犹太人公墓扫墓等活动。^[59]

四、波兰反思反犹主义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波兰在反思反犹主义方面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成为反犹主义回潮的内在原因。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历史政策”背景下,“继发性反犹主义”凸显。

与很多其他国家相比,波兰背负着更多的“纳粹帮凶”的指责,因而波兰政府和社会对这种指责也尤其敏感。为了减轻这种压力,波兰政府更强调从正面宣传波兰民族对纳粹的抵抗和作出的牺牲,有意弱化犹太人在波兰社会的不幸遭遇。而法律与公正党领导的政府,更是积极强化“历史政策”,使波兰出现了回避、否认犹太人历史,尤其是否认大屠杀中犹太人遭遇,否认波兰人对大屠杀负有责任的现象。

虽然波兰政府对反犹主义进行了一些反思,但主要是波兰左翼政党及左翼政治力量的立场,尤其是在克瓦希涅夫斯基任职总统期间(1995—2005年)完成的,而这10年基本是左派政党——民主左派联盟控制着波兰议会和政府。2005年12月,右翼保守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上台,该党强调加强民族主义,加强罗马天主教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推动天主教价值观,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在议会,它还联合了两个民粹主义政党——“波兰家庭联盟”“自卫联盟”,使波兰政局急剧右转。2015年以来,波兰的总统、议会、总理等部分都由法律与公正党所控制,政局进一步右转。

由于反犹主义具有较为深远的历史根基,对反犹主义的反思和清理的时间还不长,反思不够彻底,加上法律与公正党执政的波兰政府推行“历史政策”,使一种新型反犹主义——“继发性反犹主义”(Secondary antisemitism)^[60]开始兴起。从近些年的发展势头来看,“继发性反犹主义”已逐渐成为新的反犹主义形式。^[61]

“继发性反犹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将反

思反犹主义和反波主义联系在一起。早在1994年初,米哈夫(Michał Cichy)就发表了《波兰人与犹太人:起义期间的黑暗片段》一文,讲述了1944年华沙起义期间波兰人杀害犹太人的历史事件。^[62]该文引起了广泛争论,波兰记者协会、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院、波兰历史学会等都加入了这场争论。一些波兰民族主义者对该文提出了强烈批评,例如历史学家托马斯(Tomasz Strzembosz)就批评《选举报》(Gazeta Wyborcza)发表该文章是为了操纵与传播反波兰主义。^[63]

曾因大屠杀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格罗斯,在1996年被波兰总统克瓦涅夫斯基授予“波兰共和国功绩勋章”,但2015年,他在德国报纸《世界》(Die Welt)发表关于“二战期间波兰人杀害的犹太人比德国人杀害的还多”的观点,^[64]因涉嫌毁谤波兰国家而受到波兰检察部门的调查。2016年1月,杜达总统表示,因为格罗斯试图毁坏波兰的名声,将考虑撤回授予他的“波兰共和国功绩勋章”。^[65]贡塔尔奇克(Piotr Gontarczyk)、霍恩(Cynthia M. Horne)、斯坦(Lavinia Stan)等“历史政策”辩护派也对格罗斯进行了强烈的批评,认为格罗斯过于关注战争时期的社会病态,从而导致对波兰历史“不公平的概括”(unfair generalizations)。^[66]

2014年,由波兰文化部支持建成的“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在近年陷入“换将风波”,凸显了政府在“继发性反犹主义”中的主导性角色。“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展现犹太人的历史遭遇,遭到了波兰文化部的强烈反对。文化部长格林斯基(Piotr Gliński)认为,博物馆的主任斯托拉(Dariusz Stola)对于国家批判过多,使该博物馆“采取具有强烈攻击性的政治政策”,最终在2019年初迫使斯托拉离职,任命忠诚于波兰政府的斯滕平斯基(Zygmunt Stepiński)为该博物馆代理馆长,2020年初转为馆长。^[67]

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也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在利昂·科尔思(Leon Kieres)

任职研究院首任院长时期(2000年6月—2005年12月),由于克瓦涅夫斯基总统认为,研究院的研究有利于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和解,也有利于波兰展开“道歉外交”,因而积极支持其开展真正的历史研究。^[68]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上台之后,开始给研究院施加压力,要求遵守“历史政策”,并在2016年7月,任命法律与公正党的忠诚党员萨瑞克(Jarosław Szarek)为新院长。萨瑞克严格执行“历史政策”。在他就任院长之后,立即停止了对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的研究项目,发布了一些有争议的文件和观点。^[69]

虽然法律与公正党也对反犹主义进行了一些反思,并强调“反对一切形式的反犹主义”,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采取了推动措施。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尤其是在“大屠杀”中犹太人的遭遇上,法律与公正党仍然坚持较为强硬的立场。例如,2018年2月议会批准“大屠杀法”,禁止指责波兰民族或者波兰国家在纳粹的大屠杀中负有责任。2019年5月,马特乌什·莫拉维茨基总理(Mateusz Morawiecki)强调,只要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就不可能解决犹太人的财产恢复问题,不会与以色列或其他国家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也不会理睬美国的447号法案^[70]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承认纳粹的胜利。^[71]

其次,波兰社会的反犹主义根基尚存。

近年来,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欧洲的右翼政治势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势力发展迅速,它们均具有盲目排外、狭隘民族主义的特点,因而出现了明显的反犹主义回潮。据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坎托尔中心(Kantor Center)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尤其是2018年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反犹主义事件明显增多了,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数量也明显上升,美国超过100起,英国68起,法国和德国分别为35起,中东欧国家的反犹主义暴力事件也同样明显增多。^[72]

由于波兰反犹主义历史悠久,而反思反犹主义才出现40年左右,它在与反犹主义的较量中尚未取得压倒性优势,因而波兰社会的反犹主义

倾向不可能在短期内销声匿迹。根据反毁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2007年的民意调查,波兰对反犹主义表达的认同程度很高,在欧洲位居第二。该调查报告主要调查以下4个问题:“犹太人对以色列比对本国更加忠诚”;“犹太人在商业领域具有太大权力”;“犹太人在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太大权力”;“犹太人仍然对大屠杀期间他们群体的遭遇讨论太多”。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有45%的波兰人肯定性地回答了上述问题(西班牙47%;法国22%;德国20%)。^[73]而根据2011年一些学者对欧洲8个国家的反犹主义进行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发现波兰和匈牙利的反犹主义比欧洲其他国家明显要高。^[74]

华沙大学偏见中心2013年的调查也表明,部分波兰人仍然不能接受他们生活中有犹太人。12%的波兰人不愿意和犹太人一起工作,14%的波兰人不希望有一个犹太人邻居,24%的人不愿意与一个有犹太亲戚的人结婚。^[75]

正是有了民众基础,政府才能更加坚定地执行其“历史政策”,有时一些较为激进的反犹民众还会给政府施加压力。例如,2018年2月,在波兰议会将“大屠杀法”提交给总统签字之前,一些极右翼组织成员和反犹主义份子聚集在总统府门前,要求总统尽快批准“大屠杀法”,因为犹太人是波兰的“第五纵队”。^[76]

最后,焦点问题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反思反犹主义过程中,有一些敏感的、关键的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例如二战期间犹太人的财产补偿(非纳粹导致的财产损失),波兰人是否参与了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在波兰历史中的贡献等问题。其中,波兰是否应对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负有责任,是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是反思反犹主义的一个枢纽性问题,一直被视为波兰历史记忆中“广阔的灰色区域”。^[77]

而这个“广阔的灰色区域”的焦点,是纳粹大屠杀期间,耶德瓦布内小镇的大屠杀事件,除此之外的一些屠杀事件,都已基本澄清真相。尽

管 1946 年 7 月的凯尔采屠杀事件仍然存在一些历史盲点,但至少波兰政府早已承认这是屠犹事件,一些参与人员也得到了惩罚。^[78]

由格罗斯的著作《邻人》而广受关注的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事件,颠覆了人们对二战历史的认知,甚至颠覆了一些波兰英雄的形象,因而对该事件如何定性,在波兰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激烈的辩论。《选举报》主编亚当·米赫尼克(Adam Michnik)曾指出:这场辩论就如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那么激烈。它深深地撕裂了波兰的家庭和这个国家……这场争论的断层线不是传统左派和右派的分裂线,而是支持一个开放的波兰还是一个封闭的波兰的分裂线。^[79]

2001 年 3 月 2 日,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在回答以色列媒体的采访中表示,他拟对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事件进行道歉。^[80]同年 7 月 10 日,克瓦希涅夫斯基对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进行了正式道歉。“民主左派联盟”全国执行委员会专门向其党员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事件对我们来说是痛苦和耻辱的一种来源;没有也不可能有为该罪行与邪恶进行合理性论证的理由。我们赞同揭露和澄清波兰近年历史上的所有类似事件,不论其规模和性质如何……国家的记忆不能是选择性的,无论它将给当代波兰人带来多大的痛苦。”^[81]

波兰天主教会和右翼政治力量则持相反主张。2001 年初,波兰天主教会大主教格莱姆普(Jozef Glemp)发表了教会对该问题的态度:在耶德瓦布内小镇,的确有人屠杀了他们的同胞,但这是为了执行命令,出于恐惧,报复过去遭受的伤害,受到德国的教唆或者某种利害关系的驱使而导致的。^[82]

民族联盟党党员米哈尔·卡明斯基(Michał Kamiński)给相关部门写信,抗议克瓦希涅夫斯基“代表整个波兰民族”道歉的做法,认为在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事件中,反而是犹太人应该向波兰人道歉。^[83]时任总理耶日·布泽克(Jerzy Buzek)虽然总体上承认波兰人参与了屠杀犹太

人,但他坚决反对利用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事件来传播一种错误的指责——波兰应对大屠杀负责,或者说波兰存在着内在的反犹主义。^[84]2001 年,在法律与公正党成立之初,党主席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也表示反对为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认错,认为这是敌人想诋毁波兰人,让波兰人成为希特勒的同谋。^[85]包括曾任总理图斯克在内的公民纲领党领导人,也对承认波兰在大屠杀中的反犹主义行为不感兴趣,甚至指责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事件为“谎言”。^[86]

2000 年 9 月 5 日,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经过调查指出: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事件中的被屠杀者,应视之为波兰人而非犹太人……^[87]该观点受到了国内外多方面的质疑,波兰国家记忆研究院只得启动进一步深入调查,并于 2002 年 7 月 9 日发布了最终报告,报告指出:有理由相信,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是在德国的教唆下实施的……因此,在法律上,归咎于德国人是合理的。严格地讲,只有耶德瓦布内小镇及其周边的 40 多个波兰人参与了该事件。^[88]

这个结论虽然受到质疑,但它代表了官方的正式立场,此后,该问题成为不可质疑的敏感问题。2018 年 2 月 6 日,波兰总统批准了“大屠杀法”,进一步确认了这个立场。任何想为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事件进行平反,甚至想对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事件进行客观、真实研究的人,都涉嫌违反了法律。

五、结 语

由于独特的历史和国情,包括天主教会相对保守的宗教态度、波兰多次亡国的历史导致的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历史上犹太民族和波兰民族的巨大隔阂和互不信任、对于二战期间波兰在“大屠杀”中的角色和责任存在分歧等因素,波兰反思反犹主义的路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天主教会和政府相继对历史上的反犹主义进行反思,加强对犹太人在波兰的历史及大屠杀历史的学习和了解,开启了

波兰历史上的反思反犹太主义的启蒙。对于近年来波兰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的反犹太主义回潮现象,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些悲观主义者认为,“反犹太主义不会结束,只会变得更糟”,^[89]“欧洲犹太人不会有光明的未来”。^[90]乐观主义者则认为,波兰正在经历着犹太文化的复兴,越来越多的波兰人正在“发现”他们遗失的犹太身份和传统,波兰的反犹太主义正在衰落。^[91]

笔者认为,波兰当前的反犹太主义的力度和广度,比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前期都已明显下降。随着波兰人口的新老更替和教育程度的上升,波兰反犹太主义也将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而且,波兰的犹太人人数量很少,已不足以承担历史上的“替罪羊”角色,反犹太主义的声势总体上已走入下降通道,右翼反犹太势力虽然继续存在,但它已不能改变这个趋势。虽然“继发性反犹太主义”已上升为波兰反犹太主义的主要形式,并将长期存在,不过,在“反犹太主义”走下神坛、政坛之后,“继发性反犹太主义”与传统反犹太主义和现代反犹太主义相比,其烈度、广度及影响力、破坏力都已明显弱化。

注释:

[1] 国际上并无“反犹太主义”的统一界定。2016年5月26日,国际大屠杀记忆联盟(the 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Alliance)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通过了一个不具约束力的“反犹太主义”的定义:“反犹太主义是某种对犹太人的感觉,它可能表现为对犹太人的仇恨。反犹太主义的言辞和行为表现指向犹太人或非犹太人的个人和/或其财产,针对犹太人的社区机构和宗教设施。”参见 https://www.holocaustremembrance.com/sites/default/files/press_release_document_antisemitism.pdf。

[2] *The Jewish Chronicle*, London, February 26, 1932, p. 18. 转引自 Harry M. Rabinowicz, *The Legacy of Polish Jewry: A History of Polish Jews in the Inter - War Years 1919 - 1939*, Thomas Yoseloff, Publishers, New York, 1965, p. 17。

[3] Hugh Redwald Trevor - Roper, *From Counter - Reformation to Glorious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51.

[4] Abramsky, Ch., Jachimczyk, M. and Polonsky, A. (eds), *The Jews in Poland*, Oxford, Blackwell, 1986, p. 20; Engel, David, “On Reconciling the Histories of Two Chosen People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4. 4 (2009), pp. 914 - 929; “Paradisus

Iudaeorum (1569 - 1648)”(拉丁语:犹太人的天堂), from website of the POLIN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Polish Jews, 13 May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n.pl/en/wystawy - wystawa - glowna - galeria/paradisus - iudaeorum>.

[5] Leo Cooper, *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 p. 165, Table 8. 1. 根据该表, 1939—1945年欧洲国家犹太人存活情况如下: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数量由1935年的85万下降至1945年的30万,存活率35.3%;匈牙利的犹太人数量由40万下降至20万,存活率50%;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数量由36万下降至5万,存活率13.9%;法国的犹太人数量由30万下降至18万,存活率60%;荷兰的犹太人数量由15万下降至3万,存活率20%;比利时的犹太人数量由10万下降至3万,存活率30%;意大利的犹太人数量由5万下降至2万,存活率40%;希腊的犹太人数量由7.5万下降至1万,存活率13.3%;波兰的犹太人数量由350万下降至6~8万,存活率1.7%~2.3%。

[6] Leo Cooper, *In the Shadow of the Polish Eagle*, pp. 85 - 93.

[7] David Cymet, “Polish state antisemitism as a major factor leading to the Holocaust”,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Volume 1, 1999, Issue 2, pp. 169 - 212; European Jewish Congress - Poland, 11 December 2008, available at: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1211201802/http://www.eurojewcong.org/ejc/news.php?id_article=107; The Virtual Jewish History Tour - Poland, available at: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poland-virtual-jewish-history-tour>; Speech by FBI Director James Comey, April 19, 2014, available at: www.fbi.gov/news/stories/director-comey-speaks-at-holocaust-museum-event.

[8] Josef Banas, *The Scapegoats: The Exodus of the Remnants of Polish Jewry*,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td, 1979, p. 184.

[9] David Engel, “Poland since 1939”, *The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available at: https://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Poland/Poland_since_1939.

[10] 该宣言的中文版参见《教会对非基督教态度宣言》(Declaratio De Ecclesiae Habitudine Ad Religiones Non - christianas, Nostra Aetate, NAE),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布, 参见 <https://www.doc88.com/p-4894905615641.html>。

[11] Biedni Polacy patrzą na getto: *Tygodnik Powszechny* (环球周报), 11 January 1987; *Polin. A Journal of Polish - Jewish Studies*, Vol. 2, Oxford, B. Blackwell, 1987, pp. 321 - 336; Blonski, J., “The poor Poles look at the ghetto”, *Tygodnik Powszechny*, 11 January 1987 A, Polonsky (ed.), *My brother's keeper? Recent Polish debates on the Holocaust*, London: Routledge, 1990.

[12] Jan J. Lipski, *Dwie Ojczyzny - dwa patriotyzmy. Uwagi o megalomanii narodowej i ksenofobii Polaków*, Warsaw: Niezależna Oficyna Wydawnicza, 1981.

[13] 凯尔采大屠杀(Kielce Pogrom)是指1946年7月4日发生在波兰凯尔采的对犹太人的屠杀事件,该事件的详细情况可

以参见 Andrzej Żbikowski, “The Post – War Wave of Pogroms and Killings”, in Feliks Tych and Monika Adamczyk – Garbowska ed., *Jewish Presence in Abs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in Poland, 1944 – 2010*, First published in Polish by Maria Curie – Skłodowska University Press in Lublin and The Emanuel Ringelblum Jewish Historical Institute in Warsaw, 2011, pp. 67 – 94.

[14] Krystyna Kersten, “Kielce — 4 lipca 1946 r.” , *Tygodnik Solidarność*, 1981, No. 36.

[15] 乌穆施拉格广场为华沙的一个广场, 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期间, 大约有 50 万犹太人先后在这里被送往集中营, 因此该广场也被称为“上车广场”。作者试图藉此唤醒波兰同胞的良心与忏悔。参见 Jaroslaw Marek Rymldewicz, *Umschlaaplatz*, Paris: Instytut Literacki, 1988。

[16] 这是二战期间纳粹最大集中营 1 号集中营和 2 号集中营所在地, 参见“March of the Living International”, available at: <https://www.motl.org/>。

[17] Chrostowski, W., & Rubinkiewicz, R., *Zydzi i judaizm w dokumentach Kóscioła i nauczaniu Jana Pawła II (1965 – 1989)*, Warsaw: Akademia Teologii Katolickiej, 1990.

[18] “Bishops acknowledge role of Poles in Holocaust”,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0, 1990.

[19] Ustawa 251, z dnia 20 lutego 1997 r. o stosunku Państwa do gmin wyznaniowych żydowskich w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available at: <http://prawo.sejm.gov.pl/isap.nsf/download.xsp/WDU19970410251/O/D19970251.pdf>.

[20] Helena Datner, “The Contemporary Jewish Community in Poland and the Holocaust”, *Jewish Presence in Abs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in Poland, 1944 – 2010*, p. 765.

[21] Dariusz Stola, “Fighting against the Shadows: The Anti – Zionist Campaign of 1968”, in Robert Blobaum ed., *Antisemitism and Its Opponents in Modern Pol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84 – 300.

[22] 耶德瓦布内小镇大屠杀 (Jedwabne Massacre) 是指 1941 年 7 月 10 日, 在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 1600 多名犹太人被他们的邻居所杀 (被杀人数存在争议)。长期以来, 该事件一直是波兰犹太人历史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冷战结束后, 波兰虽然承认了该事件是波兰人而非纳粹德国干的, 但如何评价该事件, 仍然存在争议。参见 Dariusz Libionka, “The Debate around the Jedwabne Massacre”, *Jewish Presence in Abs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in Poland, 1944 – 2010*, pp. 847 – 896。

[23][35] Marcy Oster, “Poland’s president asks for forgiveness at Jedwabne memorial”, *Jewish Telegraph Agency*, July 11, 2011.

[24] Anna Radziwiłł and Wojciech Roszkowski, *Historia 1871 – 1945. Podręcznik dla szkół Średnich*, Warsaw: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 1993, p. 276.

[25] Hanna Węgrzynek,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Holocaust in Polish History Textbooks from 1945 to 2010”, *Jewish Presence in*

Abs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in Poland, 1944 – 2010, p. 693.

[26] Marek Kucia, “Holocaust Sites, Relics, Representations, and Memory: The Case of Auschwitz”, in the Common Knowledge on the Holocaust, Conference Materials, 2005. 11. 17.

[27]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Edukacji Narodowej i Sportu z dnia 26 lutego 2002 r. w sprawie podstawy programowej wychowania przedszkolnego oraz kształcenia ogólnego w poszczególnych typach szkół, *Dziennik Ustaw*, No. 51, 2002, item 458, p. 3620.

[28] Sprawy podstawy programowej wychowania przedszkolnego oraz kształcenia ogólnego w poszczególnych typach szkół, *Dziennik Ustaw*, No. 51, 2002, item 458, p. 3648.

[29] Jolanta Ambrosewicz – Jacobs, “Holocaust Consciousness among Polish Youth after the 1989 Collapse of Communism”, *Jewish Presence in Abs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in Poland, 1944 – 2010*, pp. 734 – 735.

[30] Program Prawa i Sprawiedliwości 2019, 14.09.2019, available at: <http://pis.org.pl/document/archive/download/1496>.

[31] Herb Keinon, Tamara Zieve, Lahav Harkov, “Poland’s president signs Holocaust bill into law”, *The Jerusalem Post*, February 6, 2018.

[32] “Poland Holocaust law: Government U – turn on jail threat”, *BBC News*, 27 June 2018.

[33] Kantor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Jewry, Neo – Nazis Celebrate Polish Independence Day, available at: <http://www.kantorcenter.tau.ac.il/neo-nazis-celebrate-polish-independence-day>.

[34] James Masters, Polish prosecutor: Auschwitz football chants ruled not anti – Semitic, January 16, 2014, available at: <https://edition.cnn.com/2014/01/15/sport/football/poland-football-anti-semitism/index.html>.

[36] Claudia Ciobanu, “Poland’s Holocaust Commemorations Marred by Politics”, *Reporting Democracy*, January 27, 2020.

[37] “Polish leaders campaign against Antisemitism”,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September 17, 2006.

[38] 不过, 杜达从未就大屠杀期间的错误道歉。对于 1968 年事件, 他认为应当由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权承担责任, 今天的波兰政府和波兰人则不需要承担责任。参见 James McAuley, “Poland’s president offers a nonapology apology for ‘68 anti – Semitic purge” ,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0, 2018。

[39][62] Michał Cichy, “Polacy – Żydzi. Czarne karty powstania”, *Gazeta Wyborcza*, No. 24, January 29 – 30, 1994.

[40] Jan Tomasz Gross, Saḡsiedzi, *Historia Zagłady żydowskiego miasteczka*, published by Pogranicze, Sejny (Poland), 2000.

[41][79][80] Dariusz Libionka, “The Debate around the Jedwabne Massacre”, *Jewish Presence in Abs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in Poland, 1944 – 2010*, pp. 854, 857, 858 – 859.

[42] Tomasz Szarota, “Debata narodowa o Jedwabnem” — National Debate over Jedwabne, *Więź*, 2001, No. 4, p. 38.

[43] 四种文化是指曾经在罗兹生活过的犹太人、德国人、俄罗斯人、波兰人所对应的四种文化:犹太文化、德国文化、俄罗斯文化、波兰文化。该活动具体情况参见 <http://discoverpoland.travel/event/lodz-of-cultures>。

[44] “The Virtual Shtetl”, information about Jewish life in Poland, available at: www.sztetl.org.pl.

[45] See Róża Król, “Niektóre problemy środowiska Żydów szczecińskich”, *Słowo Żydowskie*, vols. 20/21/22 (2003).

[46] Carolyn Slutsky, Poland Selects New Chief Rabbi, January 08, 2005, The Canadian Foundation of Polish - Jewish Heritage, available at: http://www.polish-jewish-heritage.org/eng/05-01_Polan_Selects_New_Chief_Rabbi.htm.

[47] Charakterystyka mniejszości narodowych i etnicznych w Polsce, available at: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51017060215/http://mniejszości.narodowe.mac.gov.pl/mne/mniejszości/charakterystyka-mniejsz/6480%2CCharakterystyka-mniejszości-narodowych-i-etnicznych-w-Polsce.html>.

[48] Ireneusz Krzemiński ed., *Antysemityzm w Polsce i na Ukrainie, Raport z badań (Antisemitism in Poland and Ukraine, Research Report)*, Warszawa: Scholar, 2004, p. 30.

[49] [59] Jolanta Ambrosewicz - Jacobs, “Holocaust Consciousness among Polish Youth after the 1989 Collapse of Communism”, *Jewish Presence in Abs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in Poland, 1944 - 2010*, pp. 728 - 729, 735.

[50] 传统反犹太主义和现代反犹太主义有时也被称为“旧反犹太主义”和“新反犹太主义”。一般认为,前者是基于宗教方面原因的反犹太主义,而后者是基于民族—种族方面原因的反犹太主义。参见 Samuel Salzborn, *The Modern State and Its Enemies: Democracy, Nationalism and Antisemitism*, Section 9: Antisemitism in Eastern Europe: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2020; Robert S. Wistrich, “The Old - New Anti - Semit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2 (Summer 2003), pp. 59 - 70; Wolfgang Benz, *Antisemitismus. Zum Verhältnis von Ideologie und Gewalt*, in *Antisemitismus.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edited by Samuel Salzborn. Giessen, 2004, pp. 33 - 50; 徐新:《反犹太主义解析》,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49-168页。

[51] Ireneusz Krzemiński (red.), *Żydzi - problem prawdziwego Polaka. Antysemityzm, ksenofobia i stereotypy narodowe po raz trzeci*, Wydawnictwo Uniwersytetu Warszawskiego, Warszawa 2015. 转引自 Anna Makówka - Kwapisiewicz, *Zjawisko antysemityzmu w Polsce na podstawie badań*, Anna Makówka - Kwapisiewicz (Redakcja merytoryczna), *Antysemityzm nie jest poglądem. Podręcznik dla edukatorów i edukatorek*, Wydawca Żydowskie Stowarzyszenie Czulent, Kraków 2016, s. 13 - 34.

[52] The Virtual Jewish History Tour - Poland, available at: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poland-virtual-jewish-history-tour>.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poland-virtual-jewish-history-tour>.

[53] [54] Bilateral relations, information from Israel Embassy in Poland, available at: <https://embassies.gov.il/warsaw-en/Relations/bilateral-relations/Pages/bilateral-relations.aspx>.

[55] Joint declaration of prime ministers of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the Republic of Poland, 27 June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mier.gov.pl/en/news/news/joint-declaration-of-prime-ministers-of-the-state-of-israel-and-the-republic-of-poland.html>.

[56] Joanna Plucinska, Maayan Lubell, “Poland, Israel condemn resurgent Antisemitism at Auschwitz commemoration”, Reuters, January 27, 2020.

[57] “About the Righteous; Statistics”, Names of Righteous by Country, Yad Vashem, The Holocaust Martyrs and Heroes Remembrance Authority, 1 January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yad-vashem.org/righteous/statistics.html>.

[58] Preparing Holocaust Memorial Days: Suggestions for Educators, January 2006, report of the OSCE 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ODIHR).

[60] “继发性反犹太主义”是指对于波兰历史上的反犹太主义持否定立场,尤其是对波兰在“大屠杀”的反犹太主义和责任进行回避、否认的一种新型的反犹太主义。参见 Lars Rensmann, “Guilt, Resentment, and Post - Holocaust Democracy: The Frankfurt School’s Analysis of ‘Secondary Antisemitism’ in the Group Experiment and Beyond”, *Antisemitism Studies*, Vol. 1, No. 1 (Spring 2017), pp. 4 - 37; Oleksii Bondarev, Nina Gabryś, and Elliot Mamet, Counteracting Antisemitic Hate Speech in Poland, a report of Humanity in Action Poland, 23 June 2015; Winiewski, M. & Bilewicz, M., “Are survey and opinion polls always a valid tool to assess antisemitism?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Jewish Studies Yearbook*, ed. by A. Kovács,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86.

[61] Dominika Bulska, Mikołaj Winiewski, Antisemitism in Poland: Results of Polish Prejudice, Survey 3, report of “Center for Research on Prejudice”, Warsaw, 2018.

[63] Tomasz Strzembosz, “Polacy - Żydzi. Czarna karta ‘Gazety Wyborczej’”, *Gazeta Wyborcza*, No. 30, February 5 - 6, 1994.

[64] Jan T. Gross, “Flüchtlingskrise: Die Osteuropäer haben kein Schamgefühl”, *Die Welt*, 13 September 2015.

[65] Matt Lebovic, “Do the words ‘Polish death camps’ defame Poland? And if so, who’s to blame?”, *The Times of Israel*, 26 February 2016.

[66] Cynthia M. Horne and Laina Stan,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68 - 69.

[67] Joanna Plucinska, “Poland names new head of Jewish museum as tensions rise”, Reuters, 28 February 2020.

[68] Georges Mink, “Is there a new institutional response to the

crimes of Communism? National memory agencies in post – Communist countries: the Polish case (1998 – 2014), with references to East Germany”,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7, 45 (6), pp. 1013 – 1027.

[69] Idesbald Goddeeris, “History Riding on the Waves of Government Coalitions: The First Fifteen Years of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 in Poland (2001 – 2016)”,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State – Sponsored History After 1945*,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18, pp. 255 – 269.

[70] 美国 447 号法案——The Justice for Uncompensated Survivors Today (JUST) Act of 2017 (Act 447)。该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欧洲各国就大屠杀期间犹太人财产损失的补偿和赔付情况进行报告。该报告对欧洲各国没有约束力, 只是一个美国自己的法律和要求。参见 Trump signs Holocaust property law that has angered Poland, *The Times of Israel*, 10 May 2018。

[71] Tovah Lazaroff and Hagay Hacohen, “Polish PM: Restitution to Jews akin to posthumous Nazi victory”, *The Jerusalem Post*, May 20, 2019.

[72] Madeline Roache, Surge in Anti – Semitic Attacks Has Caused a “Sense of Emergency” Among Jews Worldwide, New Report Says, *Time*, May 2, 2019.

[73] Anti – Defamation League, Attitudes Toward Jews and the Middle East in Five European Countries, conducted by the ADL and published in May 2007, available at: https://www.adl.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assets/pdf/israel – international/European – Attitudes_Survey_May_2007.pdf.

[74] Andreas Zick, Beate Küpper, Andreas Hövermann, *Intolerance,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A European Report*, Friedrich – Ebert – Foundation, 2011.

[75] M. Bilewicz, M. Winiewski, W. Soral, Antisemitism in Poland 2013: Research Report based on Polish Prejudice Survey II, Center for Research on Prejudice, Warsaw 2013, p. 1, available at: http://cbu.psychologia.pl/uploads/f_winiwski/PPS2%20raporty/raport_antysemityzm_ang.pdf.

[76] Vanessa Gera, “Polish leaders to join anti – Semitic nationalist at Independence Day march Sunday”, *The Times of Israel*, 10 November 2018.

[77] Joanna Beata Michlic, “‘The many faces of memories’: how do Jews and the Holocaust matter in post – communist Poland?”, in *Lessons and Legacies XI: Expanding Perspectives on the Holocaust in a Changing World*, ed. by Theodore Zev Weiss and Hilary Earl,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44 – 179.

[78] Anita J. Prazmowska, “The Kielce Pogrom 1946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unist Power in Poland”, *Cold War History*, Vol. 2, No. 2, January 2002, pp. 101 – 124.

[81] *Gazeta Wyborcza*, March 6, 2001.

[82][87][88] Andrzej Żbikowski, “The Post – War Wave of Pogroms and Killings”, *Jewish Presence in Abs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in Poland, 1944 – 2010*, pp. 67 – 94.

[83] Dariusz Libionka, “The Debate around the Jedwabne Massacre”, in Feliks Tych and Monika Adamczyk – Garbowska edited, *Jewish Presence in Abs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in Poland, 1944 – 2010*, pp. 847 – 896 (871).

[84] Oświadczenie Jerzego Buzka, 6 III 2001, quoted on the website of the prime minister’s chancellery: www.kprm.gov.pl/archiwum/4756_4770.htm (accessed, October 20, 2009). 转引自 Dariusz Libionka, “The Debate around the Jedwabne Massacre”, in Feliks Tych and Monika Adamczyk – Garbowska edited, *Jewish Presence in Absence: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in Poland, 1944 – 2010*, p. 872.

[85] Anna Bikont’s, *My z Jedwabnego*, Warsaw: Prószyński i S – ka, 2004, p. 181.

[86] Jan Nowak – Jeziorański, “Potrzeba zadośćuczynienia”, *Rzeczpospolita*, January 21, 2001.

[89] Henryk Broder, “Mehr Schutz für Juden bedeutet weniger Würde”, *Die Zeit*, 19 February, 2015; David Mikics, “Germany’s Most Annoying Jew”, *Tablet Magazine*, 30 January, 2013.

[90] Jeffrey Goldberg, “Is It Time for the Jews to Leave Europe?”, *The Atlantic*, April issue, 2015.

[91] Jeevan Vasagar and Julian Borger, “A Jewish Renaissance in Poland”, *The Guardian*, 7 April 2011.

[责任编辑:刘姝媛]